

近代金融巨子——记山西票号

- 百年沧桑
- 从颜料坊到票号
- 汇通天下 九府利赖
- 祸兮福所倚
- 官商勾结自古有之
- 饮水当思源
-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 由俭入奢易：创业容易守成难
-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 末业非末：金融史上辉煌的一页



## 1. 百年沧桑

漫步在广袤的晋中平原大地，看到那近乎破落的封闭式平遥古城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里曾是十九世纪的中国金融调拨中心——山西票号的发源地。站在古老的平遥城墙上眺望晋中大地时，人们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上上个世纪中，这里曾先后崛起过几十家著名票号，在国内外一百多个城镇码头遍设近五百个分号，成千上万，甚至是成百万、千万地为全国各地的商埠、城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等国调运银两、调剂余缺，被称为“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的汇兑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内外学术界曾兴起过山西票号的研究热潮。马寅初先生在 1923 年 11 月《银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吾国银行业历史之色彩》一文，高度评价了山西票号在世界金融史上的地位：今谈之银行业者，每谓欧美银行组织完善、发达迅速，而吾国之银行业尚属幼稚，无足述者。几不知吾国银行业极盛之时，英美德法诸国尚属草昧时代，几不知银行为何物也。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这里提及的正是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从 19 世纪 20 年代诞生到 20 世纪 20 年代彻底衰落，维持了 100 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个世纪中，

票号业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一是诞生与兴起时期。时间大致是从道光三年（1823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从道光初年的日升昌票号诞生起，这一时期票号发展到14家，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足鼎立的经营格局。业务重点在北方地区，票号汇兑总额在1200万两左右。

二是发展与扩张时期。时间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个时期票号业得到迅猛发展与高速扩张，除了平、太、祁三大帮外，南帮有四家票号加盟其中，沿海各口岸业务大增，发展迅猛，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也有较大发展。票号业开始与清政府财政活动发生联系，为其筹集饷银汇解官款。这一时期中，全国金融中心渐移至上海，沿海民族工业发展较快，票号业内竞争加剧，进入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竞争时期。

三是鼎盛与危机时期。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这一时期，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达百个左右，并在日本、朝鲜等地设立分号，开始了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赢利惊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其汇兑官款达2200万两，票号年汇兑总额达到三四亿两。但票号业在这时期也受到了新式官营银行和外国银行的冲击，同时，由于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在繁荣的背后，潜在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了。

最后是衰败与没落时期。大致是从1911年10月到1921年的十年间。武昌起义的爆发与辛亥革命在全国各地的风起云涌，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动荡，与清王朝有着密

切关系的山西票号很快陷入了困境，在商号倒闭风潮与存款挤兑风潮中纷纷破产，截止 1921 年，票号数已由十年前的 26 家剧减至 5 家。

## 2. 从颜料坊到票号

票号是 19 世纪初民间创办的为工商业者埠际间货币汇兑服务的专业性金融信用机构。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必然地与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密切相关；又由于它最早为山西商人所创办，称之为山西票号，因而还需要从山西当时工商业发展情况这一特定环境去考察。

明清时代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商品性生产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加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达，市场商品流通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规模大而且次数频繁，相应地，作为工商业发展的服务者和推进剂的金融业必然要求有巨大的发展，以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方面的便利和安全方面的保证。

山西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一块成就良将名相的地方，更是一块造就巨贾富商的宝地，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明清时期，著名的地方商人有两大势力，一是晋商，

一是徽商，晋商势力在北方占优势，徽商则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范围。众多的历史资料显示，晋商不仅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还在全国各地有着众多的分支机构，这就为票号进行埠际间金融汇兑提供了资本、机构和信息方面的必要条件。晋商的商业活动之所以遍及全国，并绵延二百年而不衰，除了善于经营的原因之外，在商业信誉方面始终坚持说一不二，笃诚待人。

在频繁的商品贸易往来与频繁的现银流通过程中，面对着银块与制钱同时流通的形势，考虑到运输成本和安全等问题，山西商人首先使用汇票进行异地间的货款支付和结算，并逐渐发展成为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

关于山西票号起源的传说很多，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起源的具体时间，至于第一家票号的创办人，无论是历史学者的调查研究，还是票号中人流传的口碑，都认为是平遥人雷履泰。他创办了山西乃至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日升昌的前身西裕成，是一家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颜料手工业作坊。其老号设在山西平遥县西大街路南，分号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场十号南口。平遥颜料商是京师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裕成颜料庄在众多颜料商行里，不仅资历雄厚，而且规模较大，同时还有一位富有才华，善于运筹，年富力强，被称为行业头面人物的雷履泰为总经理，因而成为众商之首。

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经商各地，乾隆年间的北京更是山西商人的集中地，每逢年终结帐，常有大批款项要运回山西，起初一般是从镖局运现。到了清末，由于时局动

荡、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现银失盗时有发生。这就迫使工商业者不得不改变运送现银的方式，于是就有人和北京西裕成经理雷覆泰商议，从北京往山西捎的银两，交到北京西裕成，再由北京写信在平遥西裕成用款。雷覆泰同意了方案。起初只限于朋友和亲戚关系，两相拨兑，也不要什么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方法便利安全，求拨兑的人因而愈来愈多，进而超越同乡界限，一些商人也要求代为拨兑，并愿意出一小部分汇费或手续费。同时，西裕成在京需款，也主动出外揽收，需要向汇款人交一定的帖利，可以说是存汇结合的存息。

随着西裕成拨兑业务的增多，经理雷覆泰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上“飞钱”和“会票”的经验，首先在晋京之间兼营汇兑和委托拨兑，赢利倍于往日。不久将西裕成改名为日升昌，专营汇兑。从而产生了山西和全国第一家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

### 3 汇通天下，九府利赖

西裕成改名为日升昌后，银钱汇兑业务果然繁荣兴旺。经理雷覆泰系商界能手，精于生财。他由此及彼地想到中国其他各大城镇，特别是沿海一带，山西商人颇多，支付结算款项，常通过镖局进行，殊多不便。于是对晋商

的活动地域、进销货地点作了详细调查，随即派了些简明干练的伙友到这些城市设立分庄，与这些地方的晋商拉关系，招揽汇兑业务，此地交钱，彼处用款，并做到手续简便，信用可靠。这样一来，请求汇兑者不仅有山西商人，还有外省商人，不仅有沿海一带的丝帮、米帮，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吏都与日升昌打起交道来了，日升昌的业务可谓日月昌盛，一派兴隆。有诗为证：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擢采；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山西平遥之所以在清未能形成具有六百余家商号的大镇，除了因处于交通要道这个地理优势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雷覆泰等人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营汇兑结算的票号，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既能益己又可益民的生财新路，才使平遥及其邻近地区成为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同时，日升昌票号的成立也为山西乃至全国商界开创出一渠财源畅通的“活水”。不少商号随之改为票号。最初一批改为专营票号的商号，都是山西人经营的颜料业、茶庄业、烟草业、盐业、布业和冶铁业。后来，出于防止欺骗等方面的考虑，清政府规定新票号的开业须经户部审核批准，并领取营业许可证。由于办理营业许可证须由票号出具连环保证，这就为外省票号的开业制造了客观障碍，因而票号的经营几乎成为山西人的专利。山西票商的足迹因此遍及天下。

历史资料 and 现代研究均表明：山西票号是在商号兼营或个人经营汇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营汇兑和结算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是在镖局运送现银费用高昂而且不安全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专为个人和工商铺户调拨资金头寸

的金融服务机构。其汇兑方式总结和吸收了商号兼营汇兑的成功经验，并创造性地予以发挥；同时也吸收和利用了镖局向各地运现和货币清算都以相对固定的标期的传统习惯。在中国近代银行出现以前，山西票号就在前人会票和飞钱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的汇票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汇兑结算制度，为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票号的出现，解决了异地之间贸易货款交运的困难，并用汇票解决异地商品的交易结算问题。由于其分支机构由北而南，由东向西渐次扩展，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全国票号总数已达到近二十家之多。各票号的分支机构已经辐射到全国 28 个主要城镇之中。“南至两广云贵，北及伊犁新疆，凡各通商大埠，无不有票号之招牌。”如日升昌、天成亨、志成信、大德恒等，分号都有 30 余处。它们的业务范围甚至远达莫斯科、大阪、神户、新加坡等第。光绪二十年（1894）年，京师大约有 30 余家票号，资本总额约为 1070 万两，分号共有 414 家，分布于 21 省及蒙古、新疆等地。

票号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存款和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汇费以及汇兑时收付时间差距所产生的利息所得等。存款有些不付息，有些则付较低的利息。存款又分为活期和定期两种，活期月息由两厘到四厘不等；定期为三个月至半年，利率为月息四五厘到八厘。放款利率自五厘到一分（月息），高低因邦别而不同。有些特殊的放款利率则可以定得很高。如那些未上任的官吏，需要垫付上任川资，待上任后再行归还。这种借款利率就很高，借一万两的，

实际上只付七千两，其余三千两作为扣息。

由于票号专营汇兑结算，为工商铺户从事资金调度，给异地间的工商业贸易提供了极大方便，因而赢得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四个方面：信用可靠；安全保险；便于取携；处处可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在日升昌诞生之后，很快兴旺发达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几个业务上比较发达的据点。如京师、苏州、汉口、盛京等地。各分号在总号的指导下，对内相互支援、密切合作，对外则极力扩张、相互竞争，初步形成了一个调度全国金融通的汇兑结算网络，在全国商品交易和资金流通方面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作过如下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送现金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以两清。商业以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之贡献，不可谓不大。

## 4. 祸兮福所倚

在保守专制的清王朝统治下，票号的出现被视为“异物”，在其诞生后的 40 多年间，并没有为清王朝所重视，当有些官员试图利用票号汇兑上解京饷时，却遭到了清中央政府的严厉禁止。只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南北交通的中断使京饷上解困难，并引致财政危机时，才不得

不允许通过票号汇兑京饷。

道光 30 年（1851 年）12 月 10 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就进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纷飞的交战地，商贾逃离，店铺关门，各大分号也接到总号指示，纷纷携资撤回山西总号。这就是咸丰三年（1853 年）山西票号史上有名的汉口大撤庄。

分号的撤回意味着业务的中止与利益的损失，对票商们来说，这实属无奈之举。正在发展着的票号业，在国内战争的影响下，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战争的破坏导致商业迟滞，汇兑不通，票号的业务本已受到较大打击，艰于维持。与此同时，清政府由于忙于应付内外战争，财政拮据，于是又以报效、捐输的名义向票商开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票号业的健康发展。

但太平天国起义也为山西票号涉足官款汇兑业务成为可能。

战争给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火上加油，各地京饷上解以及各种政府支出款的运输问题日发严重，因此，清政府对票号汇兑政府公款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顽固坚持装鞘运现到允许通过票商汇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装鞘解现者日少，由票号汇兑者日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迅速向东南沿海一带发展，票号业务也较以往明显增多，南方的一些官僚以及巨商也开始投资设号。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前，各地运往户部的官款饷银都是由官府派兵护送押解，一般商贾根本无法插手其中。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朝廷饷银的主要来源一南方富庶省份的

进京道路被截断，而此时清王朝正调集大军镇压太平天国，军费等相关开支庞大，急需巨额经费。但各地运送饷银行动迟缓且常被中途抢劫，尤其是饷银大户广东省尤其是如此。无奈之下，户部只得允许广东饷银通过山西票号汇解至京师。

同治元年（1864年），由清廷批准的首批官款 100 余万两经山西票号由广东汇解至京师。同年，福建、浙江、四川等省官款汇解均由山西票号承揽。尽管清政府于同治三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下过三次禁汇的命令，但此例一开，再也无法完全收住，粤浙闽等海关饷银均由票号汇兑，有时甚至需票号代为垫付。同时，各省之间的协饷与洋务经费也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并逐渐成为惯例。

巨额的官款汇兑存放业务与协饷借款业务为山西票号带来了丰厚利润，票号业也由原先专为工商业经营活动服务而成为官商结合的金融机构。

从日升昌票号的创立经历可以发现，票号原先纯粹是为解决工商业者经营活动中资金周转流通困难而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跟官府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随着山西票号业务范围的逐渐扩大，开始为应试士子等提供贷款，为其出仕为官运动提供资金服务，一些官僚也纷纷将其储蓄存入票号，山西票号与官府开始有了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很快使精明而有远见的票商们领悟到：要想让票号业务有保障并有更大大发展，就必须跟官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他们提供优良的服务，这对票号拓展业务范围，增加经营收入是至关重要的。

“祸乃福所倚”，前已述及，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

与山西票号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票号开始有了承揽官款汇兑的机遇，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官款的汇兑存放为票商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票号业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按照大清律法：官款在京只能存入户部金库，在省则存进地方藩库。因此官款存入票号只能作暂存处置，随用随取，票号不必支付利息。而票号一转身就可以六七厘的利息贷放出去，获利自然可观。

官款的汇兑存放不仅使票商们收益匪浅，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资料显示，票号自承汇各种官饷以来，在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垫汇手段的出现，更是在解决清政府的地方财政困难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政府向票号的借贷主要表现为地方各省关在京饷上解期限到达前，所收部分不敷上解，不得不求助于票号垫付，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此外，还有一些纯系借贷，并不需要汇兑，并明确言定利率的。如为了收复新疆，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左宗棠西征军，经常出现军饷和补给不继的情况，需要临时向票号借款。左宗棠也深感票号在维持其西征军军饷方面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所以，他对票号始终本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绝不“爽约失信于华商票号者，正欲留此生路，为将来商借地步耳”。西征军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的作战，迅速赶走入侵者，收复祖国河山，与票号不断地借款接济也是分不开的。

票号本身也因此不仅业务量大增，而且密切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这些情况，对票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票号从挫折中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成为近代中国金融界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而为世人所瞩目。

## 5. 官商勾结自古有之

由于官款存放汇兑业务已成为山西票号获得巨额利润的一条捷径，结交封疆大吏以争取官款业务自然成为各大票号经理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到后来，各大票号都找到了各自的政治靠山与官方业务伙伴，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网。山西票商们在与官员们交往中，自然也将他们掌握的官款业务悉数收入囊中。

在山西各大票号中，“天字一号”日升昌票号结交的官方实力最为强大。其与大批高官显要关系密切，如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等；与地方官员如广东海关官员关系也极为密切，广东海关的大批税银交由日升昌票号包揽汇兑。

日升昌票号有位极善公关的分号经理邱德基，当他主持开封分号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开封上流交际场合大出风头，与开封的巡抚、藩台称兄道弟。日升昌开封分号自然就成了当地衙门和官吏存放官款私款的金库。后来邱调任西安分号经理，又很快与陕西抚台打成一片。每次

外出，他竟乘坐只有朝廷命官才能坐的绿围四抬大轿，而且还有仪仗为其开道。有一天撞上长安知县，当知县得知票商竟敢乘坐官轿时，大为气愤，立刻命手下将邱拿下，带回衙门欲加以治罪。但当抚台得知此事后，马上命人将其释放，并请进客厅，待为上宾，丝毫也没有怪罪之意。邱泰基自然也感恩图报，在光绪年间大举发行内债赔付甲午战争赔款而商民无人认购的情况下，邱带头筹集到 40 万两，陕西抚台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对邱泰基自然更为感激。

由于官款汇兑业务涉及到户部，山西票号经常要与户部官吏打交道，为了避免他们从中作梗，票商就要经常对管事小吏进行贿赂。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都要派出车马载满红包送到各家，以求生意通达，少生枝节。

通过与官府的交往，精明的山西票商自然领悟了钱与权、官与商之间的鱼水关系。他们在生意上成功之后，也迫切希望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来可以光宗耀祖，二来也方便与官府的交往，畅通生意渠道。于是，许多票商都有了堂而皇之的一官半职。

“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创业财东李大全被授予“千总”之衔；蔚字号财东侯萌昌之子侯从杰墓碑上标明他拥有以下众多头衔：“诰授痛仪大夫、赏戴花翎、郎中衔、光禄寺署正加四级附贡生。”票商的官衔也有因功赏赐而来的，如日升昌票号经理邱泰基在中法战争期间因帮运饷银有功，被授予四品官衔，赏顶戴花翎；协同庆总经理雷沛然也因帮助官府筹措银两有功，被赏加四品衔，顶戴花翎。

可以说，票号业之所以在清末得到迅猛的发展，是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分不开的。巨额官款被允许进入山西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范围，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各大票号经理都把结交实权官吏、承揽官款业务当作自己的第一工作任务，总号也把其作为考核下属业绩与才干的主要标准。在“利益”这一共同动机的驱使下，官与商走到了一起，官员依仗票商为自己攫取更多的财富，而票商则设法从官僚手中争取到官款业务，牟取更大的利润，从而自然地达成了权钱交易的默契。这也可见政府官员“傍大款”现象并非现在才有。

## 6. 饮水当思源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清政府因战时交通阻塞，不得已允许京、协饷由票号汇兑，从此使票号和清政府的关系不断加深。但是，票号的金融活动表明，它毕竟是国内重要的商业金融机构之一。在票号的全部业务活动中，它与国内外商业、贸易的联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力图把侵略势力从通商口岸向内地渗透，于是沿海沿江一些重要口岸在商业贸易逐步开展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在这种情势推动下，以调剂地区间金融为任务的

票号，其业务自然也因之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自身经济实力也随之逐步壮大。

票号业和晚清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反映：

首先是票号自身力量的壮大。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一些商业发达地区，逐年都有新票号的设立，而以前开设的票号也纷纷向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发展。据史载，截止1874年，票号已经从五十年代的12家增加到26家，并迅速地向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如上海、杭州、福州、营口等地发展。同期中，设立票号分号的城市，也从先前的27个增加到70个左右。在全国初步形成了一个金融汇兑网。

其次，票号长期开展的汇兑、存放款等各项业务，历来都是与国内外商业贸易密切相关的。从主要通商口岸的商业贸易活动的繁荣发达中，可以看出票号业进行资金调度的繁忙景象。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国内外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已经明显地成为全国商业贸易中心。它既是庞大的进口商品向内地城市扩散的主要中转站，又是全国农副产品出口的主要汇集中心。从1865年到1895年的三十年中，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一亿零九百万关两增加到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关两。其后，这种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与这种庞大的贸易集散量相适应的，必须是发达的资金融通服务。票号凭借其无处不在的分号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远及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资金的汇兑、结算